

政法记者走基层

“源头促治”怎么做？ 在杭州拱墅，一键按下解忧“铃”

本报记者 南苏
通讯员 曹玲耀 吕曼君

“叮铃铃……”，如今，有事就“按铃”，已成为杭州市拱墅区很多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手机页面上一个简单按钮的背后，蕴藏着基层治理“大智慧”。

“协商铃”方便管用

“门口的喇叭声比我家的闹钟都准。”李先生家住叶青随苑，这个小区坐落在拱墅区米市巷街道叶青兜路上，从古河巷交叉口开始，新华实验、江心岛、建新等3所小学和朝晖新村1所幼儿园依次排开，每天早上7点，汽车的鸣笛声、电瓶车的喇叭声、人群的叫嚷声准时响起，令不用早起的李先生烦恼不已。

与李先生一样深受其扰的还有家住附近红石板社区的王大伯，“每天早上出门都如临大敌，生怕不小心被车撞到”。

“这里附近都是老旧小区，公共停车场资源比较少，我们已经在上下学期间加大了警力投入，但光靠我们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拱墅区交警大队湖墅中队队长经络无奈地说，“因素是多重的，比如小区垃圾桶外设、垃圾车行经时间与上学时间重叠、路面公交车站点多等，都增加了拥堵的概率。”

王大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响了手机小程序里的“米市协商铃”。没想到正是这个简单的动作，最终帮助王大伯解决了出行难问题，也让李先生睡上了安稳觉。

“米市协商铃”，是米市巷街道探索建立的“一键式”源头协商平台，王大伯通过“按铃”将问题反馈到街道，街道城管条线就负责牵头，迅速召集学校、居民、交警、公交、执法中队等有关各方进行“红茶议事会”，

最终提出的9项整治方案都得到各部门的落地改进。今年9月开学以来，该区域上下学时段拥堵情况得到极大改善。

令众人头疼不已的问题，“按铃”就解决了？在米市巷街道平安办主任袁学斌看来，一些复杂问题往往涉及多部门职责，单靠一个部门一时难以有效解决，而“米市协商铃”直接“对症下药”。米市巷街道坚持多方协同，以“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为核心，统筹构建了“区级部门、街道、社区、居民、社会层面”五级力量，为“居民答疑、群众解惑、协商化解”提供了理论支持和队伍支撑，并制定了《协商铃推广工作方案》《米市协商铃工作规程》等，明确了9步工作闭环。

因为方便、管用，“米市协商铃”有了不俗的群众基础。截至目前，在这个常住人口4.55万的街道，“米市协商铃”注册用户已经达到2.1万余户，基本实现每户家庭全覆盖。截至10月，“米市协商铃”已累计按铃9000余次，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907起，同比下降20.35%，并且连续三年无信访积案。

“共治警务站”在身边

“叮铃铃……”，这一次铃声响起，拱墅区石桥街道赞成武林里“共治警务站”的保安戴志良来“接铃”。

“大哥，你情绪别这么激动，泼油漆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咱不能做，你有什么问题，我帮你协调解决！”得益于上岗前在派出所接受过反诈宣传、矛盾化解等特殊培训，戴志良在面对突发状况时依然能保持镇定。“后来，我及时联系了派出所、物业、街道等，共同协商，最终化解了这起底商租户和物业之间的租金纠纷。”他说。

石桥街道是杭州市“三源治理”

30个重点街镇之一，近年来，该地区因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商住中心拔地而起，吸引了大量外来青年流动人口从商从居，造成基础要素复杂、重点警情高发等。今年8月，石桥街道探索建立了“共治警务站”，站内配备办公电脑，还安装了高清摄像头，接入云端平台实现远程监控，具备了社区警务室的警务管理功能。人员安排上，站内不仅配置了戴志良这样具备专业调解素养的保安，还有常态化驻点的公安民警以及社区和物业安排的调解员、网格员共同入驻。

“把‘共治警务站’设在位置显眼的临街商铺，一方面是为了快速出警，另一方面也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营造了‘警察就在您身边’的良好治理氛围。”石桥街道平安办主任陈科介绍，街道还在原有警铃的基础上，积极推广“石桥协商铃”，有效延伸了市场监管、劳动监察功能，强化了社会基层治理能力。自“共治警务站”启用以来，该区域9月、10月总警情环比下降了32%。

源头促治，拱墅区的法官们则通过下沉街道找“铃”感。“比如祥符街道，我们选派法官每周进驻值班，并以周报、月报形式定期分析通报纠纷化解的各项数据，最后将所涉当事人清单及批量纠纷排查清单发给街道，便于街道掌握辖区内纠纷类型，提前介入调解，协同发力，尽可能将矛盾化解在属地。”拱墅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施丹薇说。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祥符街道诉前调解成功案件数1179件，诉前调解成功分流率达46.40%，同比提高18.16%。



政法委书记谈平安

做优基层源头治理 绘就拱墅善治良景



今年以来，拱墅区紧扣“抓源促治、强基固本”主题主线，以警源、访源、诉源治理为重点，开展社会治理源头促治攻坚行动。全区社会矛盾纠纷总量同比下降7.45%，社会环境更加和谐稳定。

打造预警预测的智能模型。我们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由“信息滞后被动处置”向“线上预警提前防范”转变，在全省创先打造了“预付式消费风险研判预警系统”，归集12345信访投诉、纠纷警情等数据，重点研判一事多人、一人多事等问题，特别对美容美发、教培等群众关注度高的领域进行全周期监测、数据研判和重点攻坚，有效预防预付式消费风险。

夯实矛盾化解的硬核支撑。我们坚持把建立健全多元解纷机制作为关键环节，深化完善街道政法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由街道牵头公检法司派驻力量合力破解基层难题；法院、公安建立失联修复机制，重点解决“人找不到、事调不成”难题；法院、街道建立诉前调双向对接机制，街道派出调解人员进驻法院，法院同步选派法官进驻街道。今年全区诉前调解成功率始终保持40%以上，全市领先。

擦亮基层治理的金字招牌。我们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拱墅样板，持续打造管用好用实用的亮点品牌，不断深化“武林大妈”内涵，让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坚定支持者；创新搭建“协商铃”数智平台，通过“群众吹哨、街社报到，街社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实现“群众不跑路、矛盾不上交”；“红茶议事会”协商议事机制入选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商铺咋防盗 民警来支招



近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府前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沿街商铺，向店主们讲解防范入室盗窃知识，并现场指导如何防盗，受到店主们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何文斌 摄

打了一场官司后，外商打算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本报记者 高敏 见习记者 蓝昕宇
通讯员 魏澜

本报讯 “感谢贵院平等地保护我公司的知识产权，贵院的判决及时、有效地制止了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也对其他涉嫌侵权的主体产生强大的震慑力，坚定了我公司在中国继续进行科技创新的信心。”不久前，美国FMC公司给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感谢信。

FMC公司是一家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用化学品等主营业务的美国公司。多年前，该公司花费重金从美国某公司获得了合成农药的关键成分——“化合物A”的发明专利。2020年8月，FMC公司发现浙江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某化工有限公司在未经其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化合物A”，与“化合物B”合成一款新型农药，并予以售卖。FMC公司以专利侵权为由，将两公司诉至杭州中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100万元。

法庭上，被告认为，相关产品中所含的

“化合物A”成分，是由其自主研发的，并给出了一串化学公式“化合物C+化合物D=化合物A”，“我们和原告的合成方式不一样，并不构成侵权”。

从理论上讲，该公式确实可以合成“化合物A”，但主审法官在庭后又请教了多方学者、技术调查官等，发现该公式仅仅只能从理论上生成，实际操作过程中，该反应方式会产生“化合物A”之外的诸多副产物，纯度较低，无法投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而且目前仅有的高效合成“化合物A”方法就是FMC公司的专利。

“农药也是药品的一种，可以类推适用于‘博拉例外’规则，故不构成侵权行为。”庭上，被告又抛出了一个抗辩理由。

“‘博拉例外’规则，是一项专门适用于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相关领域的专利侵权豁免原则。简单来说就是，药品专利到期前，他人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而进口、制造、使用专利药品进行试验，以获取药品管理部门所要求的数据的行为，视为不侵犯专利权。但药品不得售卖，且需行政审批。”法官助理陈翀翀介绍说。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并不适用“博拉例外”规则。首先，该规则中指出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是作用于人体的药物，并不能类推适用于农药产品，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系农药中间体，不宜认定为“博拉例外”中的药品或医疗器械。其二，使用专利药物、成分时，仅仅只是用于进行试验，以获取药监局所需备案的数据，被告田间试验的时间也已超出该行政审批的范围。其三，被告存在销售行为，销售行为并非行政审批必要的环节。

但考虑到，该专利明年就到期了，法院根据专利的创新程度、未来市场的份额、专利所剩余的时间等要素评估其实际价值后，最终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4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被告积极履行了全部款项。

庭审结束后，外方当事人感慨道，“中国平等保护知识产权，增强了我们外商在中国经营的信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开放平等的‘大国信心’。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投资。”